

□马富贵

跋涉在唐蕃古道的藏客商队

周末漫笔

“七月流火”为何意

钱国宏

眼下已进入农历七月，翻阅报章、浏览网站，时见“七月流火”一词，用来形容天气之热、暑气之旺。其实，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成语误用，“七月流火”非但不是形容天热的，而且恰恰是形容天气转凉的！

“七月流火”一词出自《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昃，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意思是说：“农历七月黄昏，大火星的位置由中天逐渐西移，暑热开始减退，天气开始转凉。到九月天就冷了，官家发寒衣，要多穿衣裳了。十一月北风呼呼响，十二月寒天气刺骨寒。长袍和短袄没有一件，怎能熬过腊月天？”可见，“七月流火”没有天热的意思。

“七月流火”中的“火”，不是指火热、炎热，指的是天蝎座中的大火星，大火星简称火、火星、大火，也叫辰星、商星，天文学上称之为“心宿二”。此星高挂苍穹，当它逐渐西移、下坠的时候（“流”有流动、坠落之意），天气就开始转凉了。古人观察到了这一天相变化，于是就唱出了“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大火星之所以为古人所注目，是因为它在整个天蝎座中最亮的一颗，它所发出的火红色的光亮极为耀眼。古代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大火星等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逐渐摸索出了天相与时令的变化规律，从而以大火星等天相变动，来确定农时，以指导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明确指出，古人对天文星相十分看重，天文知识较为普及，而且，“七月流火”一词就是与农业生产有关，是农民总结出来的。

古人对大火星非常熟悉，很早便设立了“火正”这一官职，《左传·襄公九年》中载：“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昭公元年》也有类似的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阍伯居于商丘，主辰。商人于是，故辰为商星。”“火正”的主要职责就是常年观测“大火星”的位置变化，“授民以时”，以便安排农业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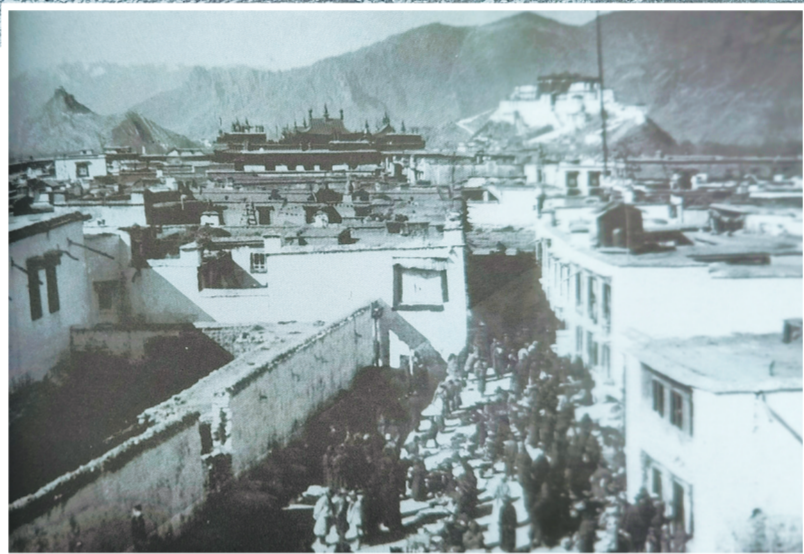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七月流火”是天气转凉的一种信号，“知暑渐退秋将至”，要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夏季天气炎热，则属于望文生义，成语误用。



藏客商队整装待发。



跋涉的藏客商队。



藏客从青海出发，目的地是远方的拉萨。图为拉萨八角街。

本文图片翻拍自《印记》一书，摄影作者为柏立美

关注

藏客，是清朝和民国时期，青海人对当地通过唐蕃古道来往于青海和西藏之间商客的称呼。其主体由汉族、回族、藏族构成，也包括少数当地的其他民族。以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藏客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拥有较为广泛的人脉以及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藏客中的回族、汉族大多会说藏语，而且是卫藏方言。

藏客大多分布在青海河湟地区，集中在西宁、湟中、湟源等商贸集散中心。西宁作为青海省省会，是藏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其次是湟源丹噶尔古城和湟中塔尔寺，这些地方吸引着大批藏客汇聚。

形旗面的大黄旗，上面由汉文、藏文、阿拉伯文三种文字贴制而成的“藏杂布”字样，简洁且大气。只要商队有重大活动或者是进藏走商，一定是旗帜鲜明、气势磅礴。当然这种气势主要来自商队自身的规模与经济实力，否则也扛不起自己商队的大旗。商队旗帜也是商队的精神支柱，商队所到之处，大旗一插，让那些小土匪闻风丧胆，望而却步。

当时青藏之间的道路，可不是现在的青藏公路，没有柏油路，也没有比较正规的大马路，只有弯弯曲曲的牛路，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藏杂布”商队在这条路上名气较大，青藏两地的官府和民间商贸中，“藏杂布”商队被允许使用青藏两地政府银行的银票和民间有限的银票。

藏客的商队出发前先准备好进藏商品，约五十驮的数量，商品繁多，门类齐全。主要有湟源陈醋和茶叶。陶瓷坛包装的湟源陈醋外面加一层竹编，路途遥远，可防止发生损坏。茶叶主要有湖南茯茶（砖茶）、云南的窝窝茶（沱茶）以及四川的竹编茶。此外还有金银制品、布料、铝制品、锅、茶壶、勺子和瓷碗碟，也有个别商户和富贵人家的个人订制品。全部置办完成，便开启艰辛而漫长的进藏之路。

商队准备完货物之后，便会到塔尔寺与该寺的主管人员进行一次详细的商谈，因为商队有一部分货物（每次大约有五六驮之多）是塔尔寺寺院的，对于这部分货物，商队只负责押运，赚脚钱，也就是押运费，不参与进货。商队每次都会护送塔尔寺僧侣进藏，护送人数不等，少则几个人，多则十几二十人。商队护送塔尔寺僧侣进藏，沿途各地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的帮助与照顾。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这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商队有排头兵，他们比大部队提前一刻钟出发，探路、放哨、向导一身多责，还要打探下一站打尖休息的地方。探路人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此以聪明、能干、可靠的年轻小伙为最佳人选。探路人也是扛旗人，扛着旗帜，背着号角。号角多为牛角制作，号角声音宏亮，也有铜或贝壳材质的，作为备用。号角用来给后面商队发信号，有平安信号，当然也有危险信号，都是提前约定和训练好的。商队的名声大，一般的小股土匪和强盗，不会行凶抢劫，但凡遇到大股的山贼和土匪，探路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担当和事佬，摆平前面的恶人路障，贼人见了旗帜就知道是哪家商队。贼人不收银票，只收银元，探路人须把提前准备好的银元放在预约好的地方，因为按规矩留下了买路钱，贼人便收钱让道。

藏客商队如果没有吃苦耐劳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到不了拉萨的。在漫漫四千里的路程中，与其他商队的合作也很重要。与官方商队、塔尔寺寺院商队以及其他一些民间商队之间，需要结伴同行，穿越草原、沙漠、戈壁、高山、大河。藏客商队踏雪山、度严寒、翻越昆仑山、跨越唐古拉山是何其艰难，同时还要时刻谨防凶猛的野兽以及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这就是旧时青藏之间的道路，其间的艰辛与困苦不言而喻。

一路上，藏客商队经历的自然灾害，

道路塌陷，桥梁损毁，运输牲畜和骑乘工具的损失等不可见的难关，都得有商队掌柜操心。平时表面上看，掌柜威风凛凛，骑着高头大马，很是风光，但他却肩负着商队大到生死存亡，小到吃喝拉撒的所有事宜，责任重大。

“藏杂布”马生贵，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四方脸盘，浓眉大眼，美髯长须，五官端正，肤色微红。他平时穿长袍短褂，头戴礼帽，如果进藏走商就是头戴狐帽，上身穿羊羔皮大衣或者是褐衫，即用染色的羊毛织物缝制的外衣。脚穿藏式皮靴，腰间佩短刀及火镰、存火器。看似彪形大汉，五大三粗的样子，但是心细如发，凡事亲力亲为，不辞辛劳，对商队成员都十分爱护。

整个商队分工明确，大掌柜“藏杂布”马生贵总揽商队全局，其大儿子马宝山分管商队置办，二儿子马德祥主管商队安保，还有其他核心人员分管账房财务，也有专人主管商队后勤。

商队每行走十天左右，便有一次大的修整，同时补充人畜所需给养。修整期间便支起掌柜等核心人员使用的黑牛毛帐篷，八角形的帐篷面积达十平方米左右，把商队主要货物放在大帐篷内。帐篷门口不远处便是临时做饭、烧水、取暖的地方，架起烧火的三锅叉，吹风工具是用山羊皮和铁管做的“火皮袋”，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因为商队有枪支，所以沿途也会打些野味作为营养补充，改善伙食。人畜都要加强营养，骡马也会营养不良、过度疲劳，需给这些骡马喂一些包装已损坏的茶叶，有时候也给骡马饮茶水，以保证骡马的体力和运力。这种大的修整在路途中间大概有六七次，一路远行，一路坎坷，一路历经艰辛。沿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人烟稀少的沙漠、空气稀薄的唐古拉山，奔向天的尽头——拉萨。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几个月的风餐露宿，几个月的饥寒交迫，在尝尽无数磨难与困苦艰辛之后，终于，“藏杂布”商队接近目的地拉萨，成功就在眼前。

临近拉萨时，结伴而行的商队，每队派出一人，组成打前站的队伍，提前进入拉萨，通知当地商铺接货，并通知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前往驻扎的客栈，迎接商队的到来。迎接场面气势磅礴，声势浩大，有政府官员，也有商界高层、宗教名士等等。商队所有人都精神焕发，迎来四千里漫漫长路的结束。在西藏修整和备货的日子，藏客与当地商人亲密无间，喝酒唱歌，享受着快乐。

到达便是成功。商队会把驮队货物存放在客栈库房，向地方政府申报缴纳税

金。经过数日交割货物，按原先定好的商号货物清单分发完毕，还要出席一些社会活动。最后，出售较弱的牛骡马等运输牲畜，重新采购。

到农历九月，他们备好了出藏的货物。大多数出藏物品属于商队之间以物换物而来。主要有藏布、毡毯、水獭皮、牛羊皮、藏红花、麝香以及瑞士“瓦时珍”手表、英国“蓝铃”“三枪”“五人”等品牌的自行车等，有洋货，也有拉萨本地出产的土货、山货。其中藏布不是在拉萨加工制作，而是来自印度。出发前，还要在拉萨八廓街举行隆重的祭祀，祈祷神灵保佑一路平安。之后，藏客商队又踏上冰雪交融的返程，到年底才能回到青海湟源。

通常，商队基本上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进藏商贸活动。“藏杂布”商队从组建到最后曲终人散，总共进行了16次之多的进藏商业往来。最远把商业贸易带到如今的印度孟买地区，就是从拉萨至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加尔各答市，最后到达印度孟买地区，销售从国内驮运来的商品物资。然后，还要置办进口货物带回国内。

“藏杂布”商队每年还肩负着把青海的回族等穆斯林朝觐人员从青海带至拉萨的使命。朝觐人员从拉萨经印度孟买，并从孟买坐船到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坐船需要27个昼夜才能到达。在第二年，“藏杂布”商队又来到拉萨，从原路接回朝觐人员。

商队主要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不论是护送塔尔寺僧侣进藏，还是接送青藏朝觐人员去沙特阿拉伯朝觐，都会有一些收益，但主要还是以商业贸易为主体，大宗商品贸易是商队主要的收益来源。

“藏杂布”商队大掌柜马生贵于1948年最后一次率商队人员成功完成交易后，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经印度去沙特阿拉伯朝觐，而后于1949年返回拉萨，并在定居拉萨14年后回到青海老家，几年后去世，享年70岁。

笔者应“藏杂布”商队后辈人的提议和口述，撰写此文，以追忆藏客商队的过往。青藏高原漫长的唐蕃古道对于藏客来说，是一条不平凡的路途，每一次出发都要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跋涉，沿途充满了艰难险阻，只有具备坚韧品格的汉子才能抵达终点。他们用生命维系着唐蕃古道的繁荣，留下了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故事。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年复一年往来于青藏两地，通过物资的大量交流，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青藏公路的开通，藏客退出了历史舞台，“藏客”的称谓也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化为一个历史符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西北，藏客的名气靠的是稳扎稳打的拼搏。在一桩桩、一件件、一次次的合作和交易中才能慢慢赢得客户的信任。有了信任，才有生意，才有出路。

在青海、西藏众多的藏客商队当中，有一支商队很有名气，那就是“藏杂布”商队，其创始人是“藏杂布”马生贵先生。“藏杂布”既是马生贵的藏族名字，也是商队的商号，“藏杂布”出自藏语，有幸运之意。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风华正茂的“藏杂布”马生贵已经在大批藏客中崭露头角，富有领导力。

马生贵带着两个儿子、本族子弟和其他人，组建了“藏杂布”商队，商队设有自己的帐房（财务）、置办（采购、销售）、安保以及强大的驮队（运输队）。

藏客商队主要行走在青海、西藏的高海拔地区。首先从青海塔尔寺出发，经湟源丹噶尔古城，翻日月山，进海南柳稍沟、上塔拉、过玉树，再从玉树走茶马古道老路直奔唐古拉山。缺氧、高寒是该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因此，驮队主要由骡子和高原牦牛组成，很少用马作为运输工具和骑乘工具。为了满足货物运输需求，商队一般拥有三十多头牦牛和二十多头骡子。他们赶着牦牛和骡子，艰难行走在高寒缺氧的唐蕃古道上，历尽千辛万苦把丝绸、布料、茶叶、瓷器以及金银制品、铝制品等货物运到拉萨。

因为牦牛的速度和灵活度不高，“藏杂布”商队的安保队伍所用牲畜不是牦牛，而是以骡子为主（一般五匹左右），也有少量的马匹。大多数情况下，商队的所有人员都配备长枪和短刀，商队安保人员配置的武器更为精良，包括德国造的七九长枪、左轮手枪以及长刀和短刀。其中，短刀同时也是生活用具。

藏客最讲究牛、骡、马的装备，民间有“上马三千元”的说法，意思是藏客商队一匹马的配置最少需要三千元。一匹好马、一副好马鞍、一套防卫刀枪，还有骑马者的服饰，都需要相当的银两来支撑。好马配好鞍，奢侈的马鞍多是铁鍍金的，还有错金错银和鼓子皮、鲨鱼皮以及景泰蓝装饰。其次是防卫装备，有纯银的刀鞘，还饰有银烧蓝的花纹，刀柄是象牙的。这些配置彰显的不仅仅是一个商队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显示商队的精神面貌，用青海话来说就是“耍人”着呢。

“藏杂布”商队也有自己的旗帜，在商队组建初期就已经设计和制作完毕，三角

百件文物说青海

□黄志成

辛店文化三角纹尖耳彩陶罐



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是当地村民20世纪70年代在打墙取土时发现的。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组队发掘，会同民和县文化馆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共清理墓葬367座，出土陶器500余件，以盆、壶、罐为固定组合，出土铜、石、骨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装饰品2690余件。

1980年在小旱地南面的山家头墓地挖掘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的墓葬33座，出土陶器69件和若干石器、骨器。通过大量的墓葬和丰富的文物资料，确定该墓地是一处青铜时代辛店文化遗存，农业很发达，它的发掘为辛店文化的研究丰富了新的内涵，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研究价值。

这件辛店文化三角纹尖耳彩陶罐造型独特，出土于核桃庄小旱地墓地第193号墓，侈口，双尖耳，鼓腹，平底，质地夹砂红陶，高16.5厘米，口径9.8厘米，腹围13.4厘米，底径4.5厘米。口沿和颈部饰两周黑彩倒三角纹，三角形纹内填充平行线纹。器型较为少见。第193号墓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头龕，头龕底与墓底平，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墓主人为女性，25岁左右，左肩处放有骨梳一件。这件随葬陶器出土时口沿上盖一石块，放置在头龕内。

该彩陶三角形纹内填充平行线纹的装饰技法，不仅出现在以小旱地墓地随葬彩陶为代表的辛店文化的彩陶中，而且折线、对三角、回纹等几何纹样同样为齐家文化、马厂类型、半山类型等文化类型的常用构图元素。小旱地墓地出土的精美彩陶，总体来看，现在虽不能就其彩绘风格和整体图案找到渊源，但若将其分解为各种构图元素，不难发现其与相邻地域或相近时间的其他文化之间，尤其是齐家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承接关系。墓地的地层关系也证明了山家头类型是齐家文化向辛店文化婚嫁川类型的一个过渡类型，也是辛店文化的早期类型，早于辛店文化婚嫁川类型。对于研究辛店文化的渊源、河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图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